

西方马克思主义

译文集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西方马克思主义”译文集

杨树 石武 选译

张 峰 编校

葛 力 校订

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西方马克思主义译文集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怀柔孙史山印刷厂承印

850×1168毫米 32开本18.6875 印张 482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丛书编号：10—2 成本费：4.00元

印数：1—3000

(党校内部发行)

关于编印《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的说明

编印《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的目的，在于为各级党校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资料，以促进党校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凡是党校工作人员编写译述的资料、试用教材、译作、专著，具有相当参考价值而不宜公开发行者，均在编选之列。希望广大党校工作者给以支持和批评，帮助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使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党校教育正规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6月17日
6/17/84

出版前言

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青年教师说：“我们党校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大本营。”壮哉斯言，如果不以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为己任，那还谈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既是严整的科学体系，又是革命实践的指南。作为前者，它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探讨其中所蕴含的全部精义；作为后者，我们必须在实践中运用它、检验它，并不断以崭新的材料、崭新的观点，崭新的论证去充实它、丰富它。马克思主义这两方面的特征在人们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真理内容，才能在实践中运用自如；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在实践中的运用、检验，人们才有可能真正体会马克思主义的奥义。毫无疑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出现，必将是这两个方面的密切结合的不可避免的产物。

我们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这两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有没有具备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学派（或诸学派）的基础条件？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静态的和封闭式的研究中迈出来，面向两个文明建设的实践，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步骤是要善于从广阔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诸思潮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对一百年来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步的思维成果，采取“兼收并蓄”的积极态度。

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要

的、颇有影响的学派，即使从梅劳一庞蒂1955年在他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算起，也已经有整整三十年的历史了；如果再追溯到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这种思想的源流的话（梅劳一庞蒂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那么它就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悠久历史表明，对于这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思想倾向，决不是贬斥几声“修正主义”，逐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门所能抑止的。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个体系严密、思想一致的学派，集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杆旗下的，是一群思想庞杂、观点各异的人物；即使是同一位学者，早期的思想和后期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把他们笼统地划在一个框子里是不适宜的。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有一些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吸取的思想，即使是一些在传统的观点看来是荒唐谬误的观点，也不乏可供借鉴和进一步思考之处。就如本书介绍的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精彩论述，柯尔施对黑格尔死后的德国哲学的争论的评价，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哈贝马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自动调节”的所谓“新资本主义”的理解，德拉一沃尔佩和科莱蒂认为卢梭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决定性前提的观点，科莱蒂关于列宁和考茨基的国家观点的对比研究和他本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见解，胡克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都应该是民主的”断语，马尔科维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暂时的倒退”和批判特征的论断，彼德罗维奇关于革命的不同概念的论述等，都很有启发性（后两人虽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但他们的思想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紧密联系，故特一并收入本书，以资参考）。鉴于这些人著作浩繁，要全面了解他们的观点十分困难。所以本书只是选译了他们的主要著作的主要篇章，供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参考。

由于参加本书翻译的人数较多，而且全部是年轻的研究生，

所以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文笔风格也不甚一致，幸经葛力教授等帮助校订，得以略补疏漏，欣慰之余，谨向校订者致以谢意，并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教。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编选组

1986年5月31日

说 明

本译文集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原著（英文版）编译而成。

哲学教研室葛力教授审阅了全部译稿并复校了部分译文；张峰同志负责文论选编和译文校对。译者杨树、石武为1983级哲学专业研究生（依姓氏笔划）王建武、王南湜、石向实、白亚光、邢新力、刘星翔、肖振远、张晓玲、陈赞周、周沛、周熙明、郑卫民、荣新海、顾红英、徐向红、席文起、黄文虎、曹二宝。因我们水平有限，编译中难免有不妥当之处，敬希读者指正；如需引用，请查对译文所据原著（英文版）。

在本译文集编译和出版过程中，哲学教研室的领导和有关同志给予了鼓励和支持，谨在此表示感谢。

一九八六年四月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构

(代序言)

葛 力

今天，马克思主义正以雷霆万钧之势震撼整个世界，不但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向马克思主义宝库寻求真理，而且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怀有不同的目的，也钻研马克思主义，试图了解其中的重要理论。在人类历史上，就影响而言，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能和马克思主义相比拟。但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在马克思主义周围，一直回荡着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即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意指西欧和北美各国，尤其重要的是表明这种主义围绕马克思主义中的种种课题，进行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一种理论。它独具特色，具体说来，这种特色就是以某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以至曲解马克思主义，当然与马克思主义本来的面貌不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出自梅劳一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该书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标题展开了第二章的论述。书中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冲突在马克思那里已经被发现为辩证法思想与自然主义的冲突。”^①这种观点显然是蓄意贬低列宁主义，高扬“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过必须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称谓就此确定下来了。这种称谓的内涵庞杂纷繁，囊括有关的各式各样的派别和倾向。在第一次大战以前，由于当时流行的思想影响，出现了这种现象，诸

^①梅劳一庞蒂，《辩证法的历险》，伦敦1973年英文版，第64页。

如新康德式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经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类马克思主义恐怕还不能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能称之为前“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出现的标志是卢卡奇于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突出的特点是使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倾向中的典型，随后还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其他体系相结合的情况，这就产生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来源方面，它或追本穷源，依赖历史上的哲学体系，或着眼于现代化，同现代外国哲学融为一体。此外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未能取得应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横行霸道，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又出现过一些惹人注目的情况。从三十年代起，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是于1932年以德文发表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公诸学术界，使一些西方学者力图依据《手稿》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形成研究《手稿》的热潮，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

就内容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等；某些学者同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彼此的观点并非一致，甚至相互抵触，但是，总的说来，其中都含有一种基本结构或一些基本因素。

一、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做这种工作的应该首推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高度评价黑格尔，利用黑格尔的思想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思想揉合在一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卢卡奇运用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并把异化和物化等同起来。他所谓异化或物化无非具有这种意义：主体的劳动成果和

自己疏远了，不受自己支配，相反，却变成和自己对立的东西。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援引马克思关于物化现象的论述，即主要是生产者对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已由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者转换为存在于客观世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随后写道：“在这里，具有中心的重要性的是，由于这种情况，一个人的自我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某种客观的和独立于他的东西，变成了某种依靠外在于人的自主性而控制着人的东西。这种现象既有客观方面，又有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客体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世界（商品和商品在市场上的运动）出现了，支配这些事物的规律确实逐渐被人们发现了。但是，尽管如此，这些规律依然作为产生它们能量的看不见的力量而同人相对立。个人可能利用所掌握的这些规律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却不能借助他自己的活动来改造这一过程。在主观方面，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变得同他自己疏远起来，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非人的客观性，它象任何消费品一样，必须按照自己独立于人的方式来活动。”^①

异化或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独特的现象，其核心的含义是，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人创造了与自己敌对的东西，他的价值和尊严同他支付的劳动、造成的产品的总量成反比；他完全变成了物，变成服从机器运转过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必要的环节。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科学管理下，生产越合理，工人越丧失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正象卢卡奇所说的，“人在客观上和在对他的劳动关系上，都不表现为那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恰恰相反，他是作为一个结合在机械系统中一个机械的部件而出现的。他发现这个机械系统已经预先存在并且是自给自足的，它不依赖于他而自己运行，而他不管愿意不愿意，不得不服从它的规律。随着劳动逐渐合理化和机械化，他的活动越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剑桥1971年英文版，第170页。

来越失去主观性和越来越变得静止，从而越来越失去其意志力。”^①早期的马克思也讲与卢卡奇物化概念相当的异化概念，他所谓异化意指，在交换价值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转化成事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个人的能力转化成客观的财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观念占有突出的地位。为此，卢卡奇受到波兰沙夫和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的颂扬。后者明确指出，卢卡奇在还不知道1844年《手稿》的情况下，就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象中得出与之几乎相当的结论，他的思想是重要的。仅就异化的内涵而言，卢卡奇和马克思的观点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从异化之产生及其消灭的途径看，二者的差距很大，不可同日而语。在马克思那里，异化是一个历史概念，标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旦推翻私有制，异化现象将随之消失。而在卢卡奇看来，异化出自人的本性，导源于人的本质和他的存在相冲突，实际上即人的本质受到压抑而变形和削弱的结果。这样，异化似乎变成为一个永恒的概念，好象人性无可改变，异化总是笼罩着人类世界。马克思要扫除异化，采取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②而卢卡奇却不衷心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只希望无产阶级觉醒，认识到物化的情况，认识到自己已变成商品。他认为一旦它有了自我认识，它就会起来反抗社会生活中一切物化的形式，就会把全人类从受客体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他寄希望于工人委员会，使之体现无产阶级意识，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

① 《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卢卡奇是黑格尔、狄尔泰和文德尔班的学生，黑格尔对他尤其深有影响。他的异化或物化观念就是承袭黑格尔的思想，用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使马克思主义染有黑格尔色彩。

除去异化观念以外，卢卡奇还从黑格尔那里接收了总体性（totality）观念，这个观念的含义类似于整体（whole）。是他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方法的。他反对实证主义者肢解事实，片面地看待事实，要求人们根据总体性的观点进行观察和理解，就是要使部分划归在整体以内，使部分在总体中获得意义。他认为无产阶级科学有革命性，并非仅仅依赖于它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观念，而首先是因为它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就是总体性，总体性范畴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科学中革命的原则的支柱，就是说没有这个范畴，就无从表达科学中的革命原则。如果作出科学的解释，正确地运用，这个范畴应该是个得力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是重视总体性的，依据整体性来理解社会现象。比如斯尼纺纱机，本身只是斯尼纺纱机，只有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它才变成资本。直接知觉一种机器不能揭示它作为资本的职能，只有考虑到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过程，才能看到这一点。^①对机器来说是如此，在处理其他社会现象上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

涉及总体性观念的来源，卢卡奇肯定马克思是追随黑格尔的。他说，“我们这样理解辩证法的基本论断、黑格尔关于具体概念的理论。这种理论简要地阐明整体先于部分：必须根据整体来解释部分而不是相反。”^②的确，黑格尔表达了这种思想。论及全体（即整体——作者）与部分的关系时，他写道，“这些部分彼此是不同的，而且是各自独立的。但只有就它们相互间有同一

^①参看L·科拉柯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潮流》，牛津1978年英文版，第3卷，第266页。

^②转引自上书，第265页。

联系，或就它们结合起来而构成全体来说，它们才是部分。”^① 卢卡奇据此而断言，“整体的这种绝对首要性，它凌驾和超越其部分的抽象的孤立——这是马克思的社会观和辩证法观的本质。”^② 他极力把马克思的思想同黑格尔的观点联系起来。

卢卡奇坚持突出整体性的作用，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方法，即观察事物的方法，主张运用这种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看到某种客体在社会总体中的作用。全部社会过程是一个统一的总体，研究这个总体的科学也应该具有总体性，这样的科学是唯一独特的科学，包括人类历史的整体，即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法律等等；它是关于有整体性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科学，表明只有在社会的总体中才能显现个别现象的意义。而且他肯定能够认识到社会总体性是一个历史的总体性，或者说有“对总体性的渴望”，无产阶级无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就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异化现象。他只关注总体性的逻辑的先在性、一味在思辨的轨道上滑行，忽视现实的社会条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以及革命斗争的实践，无疑是陷于唯心主义的幻想之中了。

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试图通过异化、总体性以及其他一些黑格尔术语来追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正象他自己在1967年新版《历史与阶级意识》前言中所承认的，是对待马克思的方法造成了黑格尔式的歪曲。

除去卢卡奇着意从黑格尔那里追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渊源以外，柯尔施也关注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的影响。他宣扬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从历史上看，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有意识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体系

①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1页。

②转引自L·科拉柯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潮流》，英文版，第3卷，第265页。

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社会政治实践里有联系，作为这两种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的思想体系也必然有联系，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有联系。^①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整体性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整体性方面看待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视之为活的整体，充分表明了这种联系。整体概念显然来自黑格尔，柯尔施试图从这里揭示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关系，这也表现了他使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

应该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思想联系起来的不只是卢卡奇和柯尔施，马尔库塞也显示了相似的倾向，甚至阿道尔诺尽管对客观唯心主义持批判态度，却依然把自己的主要作品建立在《精神现象学》的基础上，颂扬“黑格尔的方法培养了《最低道德的方法》”。^②我们的目的仅在于勾画“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追本溯源的工作的一个侧面，这里就不再一一例举了。

与以上所述的工作并驾齐驱的是利用现代外国哲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结构主义断言每一事物都有其结构，结构对事物的整体性能有决定作用；要了解一事物的重要特征不只要发现和判定其运动和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掌握它的结构规律。这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它的缺陷是忽视构成事物的因素对事物性能的影响，并染有一定的先验论色彩。阿尔都塞就用这样的结构主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提出一种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方法，即所谓“依据症”

①参看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纽约1970年英文版，第30页。

②参看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候阅读”，就是要把用文字明白表述者同隐寓于原文的“理论框架”中出现的“症状”，如空白、短缺和沉默等连接起来进行阅读和钻研。他认为一种学说都有“理论结构”或“总命题”，这种“理论结构”或“总命题”，没有明显的表现形式，却深藏于特定概念和具体命题之中，无宁说它就是特定概念和具体命题之联系形式或结构。只有把握住这种“理论结构”或总命题，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指出，马克思论及黑格尔的辩证法时，“甚至说到‘辩证法在黑格尔手里所遭受的神秘化’、它的神秘性质的一面、‘它的神秘化的形式’，他明确地用他自己辩证法的合理的形式（rationelle Gestalt）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神秘化的形式（mystifizierten Form）对立起来。”^①阿尔都塞力图划清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界限，他是从结构方面着眼、借助结构概念来实现他的目的的。他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原则上’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对立，如果它是合理的，不是神秘的、神秘化的和有神秘性质的，这种根本的区别必然显现于它的本质中，那就是显现于它的独特的确实性和结构中。明确地说，这意指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数量向质量的转化和矛盾等等，对马克思……来说有一种结构，不同于它们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②在这里结构是带有关键性的概念，是阿尔都塞用以区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辩证法方面，阿尔都塞也采用了结构概念予以解释。他主张“多元决定”论。所谓“多元决定论”表明社会是一个拥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结构层

① 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英国1979年英文版，第92——93页。

② 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英国1979年英文版，第93——94页。

次，即结构复杂的统一体，其中经济结构永远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决定哪一种结构层次可以成为某一特定社会形态中的“主导结构”，但是它所以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并非仅仅单独依靠经济因素来实现，而是借助于经济、政治多种因素及其结构层次相互作用而促成的。可以设想，在阿尔都塞看来，社会是一个大结构，其中包括一些小结构，或结构层次，这就是大结构套小结构，没有一种结构层次能够独立自主、单独起作用，甚至经济结构要起作用也要通过经济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联合起来、发生相互作用来完成。这就是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实质。阿尔都塞还用这个观点来看待历史。尽管他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有决定性的作用，是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却断定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决不是单纯的经济矛盾，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及其结构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果。简言之，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矛盾有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其中一种矛盾支配其它矛盾，这种支配是以一个复杂整体为前提的，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实，对复杂整体来说是本质的，而复杂整体是一个有统一性的结构。但是，他说，“矛盾与它处于其中的社会机体的整个结构分不开的，与它存在的**正规条件**分不开的，甚至与它所统辖的**事例**分不开的；它从根本上受它们影响，它决定，而在同一时刻又被决定，被它所推动的社会构成的各种**层次**和**事例**所决定；它可以称为在原则上过分被决定了。”^①这样，各种矛盾处于平等的地位，彼此互相决定；无分主次，多元决定论起决定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丧失了应有的地位。

阿尔都塞试图以结构主义的精神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但是他的结构主义只看到社会为结构，忽视了它的历史；只考察社会关系为客观结构之间的关系，没有摆正人的地位。而马克思却肯定构成社会关系的是人类，而不是所谓联系或结构；他还特别重

^①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英文版，第101页。